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珞珈智库 · 经济观察

(2020.2) 抗疫经济特辑 2



- 新冠疫情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
- 中国经济多管齐下保增长的对策举措
- 化“危”为“机”，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 新冠肺炎疫情对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影响与对策



关注政策前沿 研判经济态势 聚焦发展热点 探索发展路径

珞珈智库·经济观察

编委会（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郭熙保 胡 晖 李 卓 刘 岩 刘传江 罗 知 汤 昕

肖光恩 肖利平 杨 冕 叶初升 余静文 赵奇伟 朱晓东

主 编：刘传江

本期执行编辑：龙颖桢

编 辑：珞珈经济观察工作室

电 话： 027 68752310

邮 箱： cedr_thinktank@whu.edu.cn

主办：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协办：武汉大学《经济评论》杂志社

武汉大学人口 资源 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陈继勇 杨格

一、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联系紧密度及一体化程度

随着东亚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东亚区域内出现了生产分工分散化的特征，即产品的生产不再只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国家中，而是通过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形成了复杂的新型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将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进行。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联系紧密度，本文按照广泛经济类别分类（BEC）方法将商品分为中间产品、资本品和最终产品三大类，其中中间产品可进一步分为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零部件三类。由图 1 可以看出，中国主要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且中间产品的进口主要为零部件和半制成品，初级产品所占份额较小。2003 年到 2018 年，中国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的中间产品占中国中间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整体变动不大，资本品的进口比重有所下降。具体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占比均大幅收缩，由 17.02% 和 22.09% 跌落到 6.98% 和 16.59%，其中中间产品贸易中降幅最大的为半制成品；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盟，2003 年东盟无论在半制成品、零部件还是资本品上对中国的出口都比较少，而在 2018 年东盟取代日本成为中国在东亚的主要中间产品来源地，在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份额中占到 12.15%，对中国的资本品出口份额也超过韩国，仅次于日本；韩国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中的地位基本不变，份额保持在 10% 左右，但在对中国的资本品的出口上，份额减少了一半以上。即从曾经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从日本进口中间产品并自行进行加工组装出口到欧美市场，转变为中国对从东盟和日韩进口的中间产

* 本文原载《亚太经济》2020-03-20，略有删节。

品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产业链分工的程度更深，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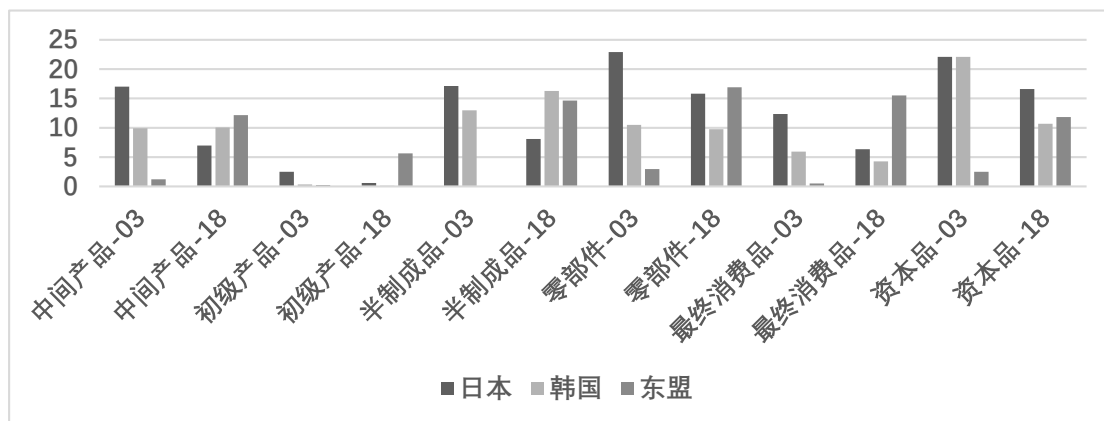


图 1 2003 年和 2018 年中国细分产品进口中各经济体所占比重 (%)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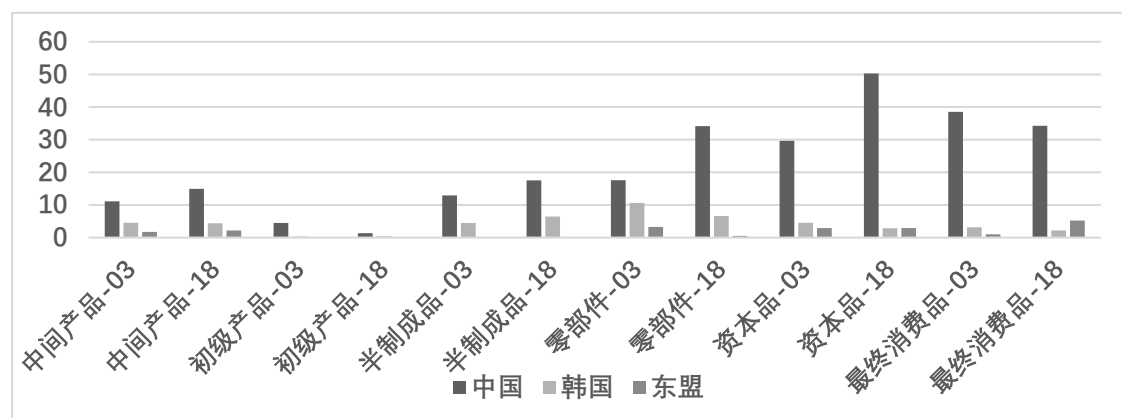


图 2 2003 年和 2018 年日本细分产品进口中各东亚经济体所占比重 (%)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从东亚主要经济体在日本三类产品的进口上所占的比重来看（见图 2），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占日本中间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有所上升，从 2003 年的 11.12% 提升到 2018 年的 14.95%，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零部件，份额扩大了接近一倍，同时来自中国的资本品的份额也有所增加。东盟和韩国在日本各类产品的进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且变动不大，仅韩国在半制成品的份额上有微幅上升，以及在零部件的份额上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从东亚主要经济体在韩国三类产品的进口上所占的比重来看（见图 3），除了在韩国最终消费品的进口上中国与日本所占的份额都有所下降、东盟所占份额大幅提升外，在中间产

品和资本品上中国与日本的份额变动趋势正好相反，从中国进口的两类产品所占份额与 2003 年相比扩大接近一倍，而从日本进口的份额降低几乎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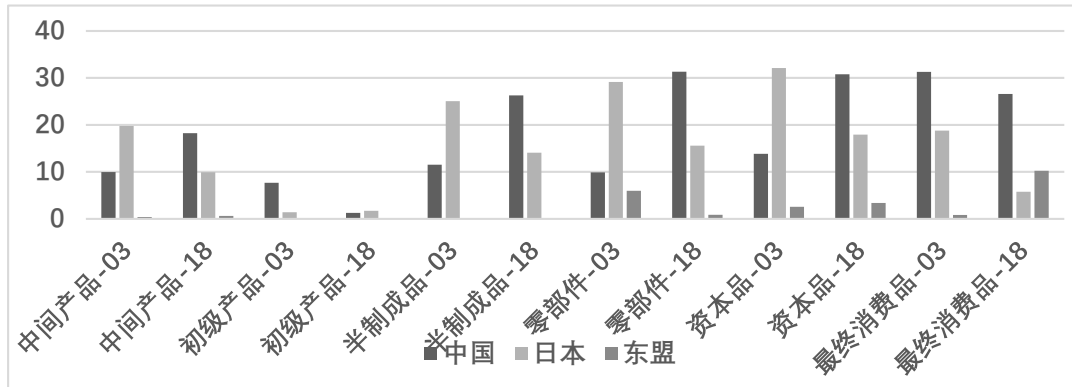


图 3 2003 年和 2018 年韩国细分产品进口中各东亚经济体所占比重 (%)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是日本在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来源地，并且这一地位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同时中国也取代了日本成为韩国在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来源地。随着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的增长，中国在东亚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二、新冠疫情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生产联系的紧密性会使外部冲击的传递更加顺畅，造成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鉴于中国在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中的枢纽地位，以及日本和韩国对中国部分中间产品较高的依存度，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扩散将对整个东亚产业链带来较大的影响，且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政府为防范疫情扩散而采取的全国性隔离停产措施会严重阻碍中国国内物流交通、企业生产以及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使得短期内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供给与需求中断，可能造成东亚生产链断裂；其次，日韩疫情升级可能也会导致两国采取类似中国的全国性隔离停产措施，考虑到日本与韩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一旦其工业生产出现问题，将对东亚产业链造成较大的影响；最后，由于中国处于将东亚生产网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最最终加工装配环节，欧美等国家为防范疫情扩散而采取的对自身以及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会从需求端对东亚产业链形成再次打击。

（一）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中国采取的全国性隔离停产措施使得全国范围内大部分产业的正常生产与进出口活动都受到限制。为了研究其对东亚产业链所造成的具体影响，本文将进一步从中国整体的角度以及疫情相对较重省份的角度分别展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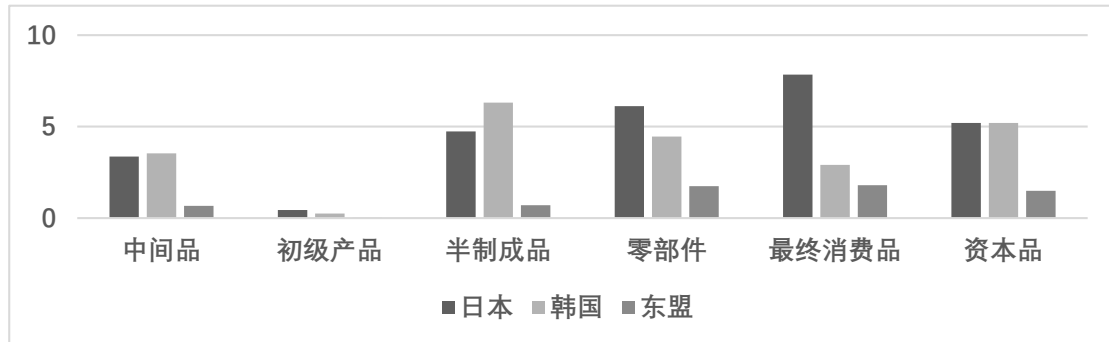


图 4 2018 年中国细分产品出口中各东亚经济体所占比重 (%)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首先从中国整体的角度来看，在对东亚经济体的中间产品、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的出口上（见图 4），日本和韩国是中国三类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而东盟在三类产品上占中国的出口份额均较低。中国出口到日本和韩国的中间品占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的比重相似，但从细分类别上看，中国的半成品较多的出口到韩国，零部件较多的出口到日本；中国的最终消费品中有 7.84% 销售到日本，远高于韩国和东盟，在资本品上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份额相仿。因此，新冠疫情导致的中国生产停工与外贸受阻对东亚经济体中的日本与韩国影响最大，其中对日本的影响主要在零部件、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的供给上，对韩国的影响主要在半制成品和资本品的供给上，而对东盟的供应链下游厂商影响有限。

从疫情相对较重的省份来看，截止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湖北、广东、河南、浙江以及湖南的累计确诊病例均超过一千例，其中作为最初爆发地的湖北最为严重，累计确诊 67800 例。考虑到确诊人数以及工业化程度的高低，本文主要对湖北、浙江和广东三个省份进行分析。

新冠疫情对三省产业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交通管制以及推迟复工。在针对疫情的交通管制程度上，三个省份由紧到松排序依次为湖北、浙江和广东，其中湖北省内多数城市进入封城状态，省内主要道路、车站以及机场关闭；浙江省部分城市高速出口关闭，但是省内高速主线保持通畅；广东省在大部分机场、车站、码头和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立临时体温监测点，但没有影响其正常运转。在疫情防控出现积极信号后，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工作重点开始调整

为保障交通顺畅和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湖北、浙江和广东 2018 年的 GDP 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4.3%，6.1%和 10.6%，而三省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4.7%，6.4%和 11.2%，均高于 GDP 所占的份额，说明湖北、浙江和广东对全国的第二产业的影响力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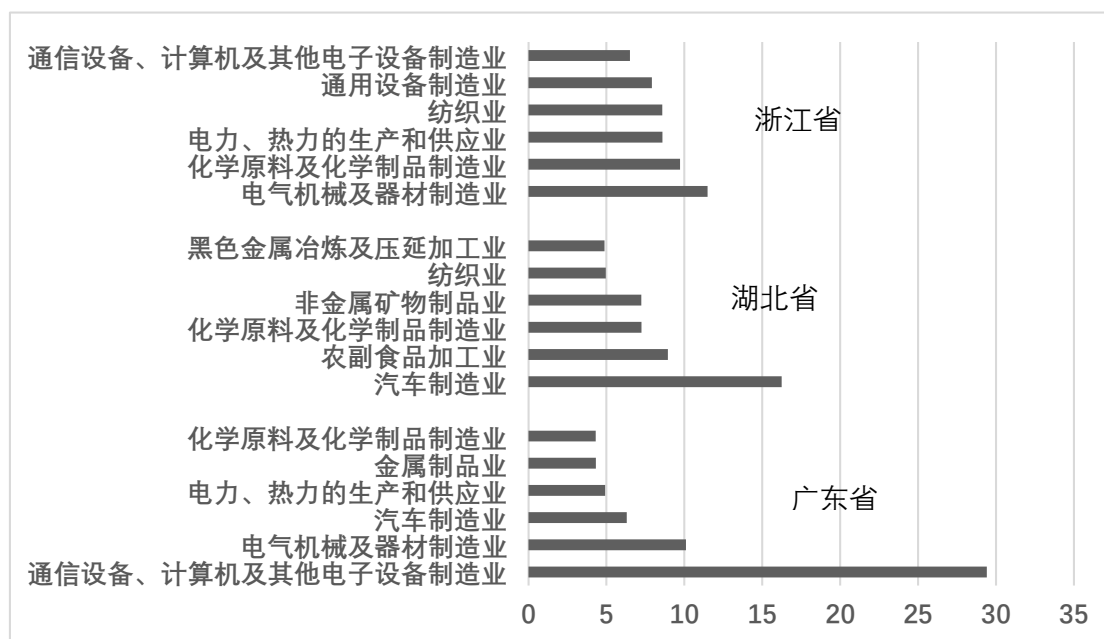


图 5 湖北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主要行业工业总产值占比 (%)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其中浙江省为 2017 年数据，广东省和湖北省为 2018 年数据）。

在对外贸易上，广东的进、出口贸易金额最高，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 25.18%和 19.61%；湖北的进、出口贸易金额比较低，仅占全国的 1.44%和 1.02%；浙江的进、出口贸易金额低于广东，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 13.39%和 5.43%。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湖北省的疫情最为严重，但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有限，广东省和浙江省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力较大。

具体到湖北、浙江和广东的主导产业，由工业总产值占比来看（见图 5），三省的主导产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 16.24%、29.4%和 11.49%。除此之外三省份额较大的共同的行业还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其在湖北、浙江和广东分别排名第三、第二和第六。

综合考虑到湖北、浙江和广东的经济体量、第二产业以及进、出口贸易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新冠疫情导致的三省物流受阻、复工推迟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会更多的表现在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上，东亚地区的这些产业下游的厂商可能会因为来自中国的中间品或资本品的短缺而中断生产。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汽车行业的产业链很长，国家及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较为细致，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早期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汽车零部件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2018 年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出口额超过 600 亿美元，约占全球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额的 10%，中国汽车制造业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汽车产业链中。本次疫情较为严重的湖北、浙江、广东等省份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众多，作为疫情初始爆发地的武汉市就拥有近 500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且其中 54 家为世界 500 强。因为国外下游整车厂为节约成本实行零库存管理以及在短期内替换供应商的可能性较低，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带来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延期复工致使国外一些整车企业也被迫延期复工或停产。由于在东亚生产网络中日本与韩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依存度较高，生产中断的情况首先在这两个国家出现，武汉封城后不久现代汽车在韩国蔚山的部分工厂以及日产汽车在日本九州的工厂均因中国零部件供应商无法供货的问题而停工。

（二）日、韩疫情升级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当中国的湖北省外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时，东亚区域中的韩国与日本进入新冠疫情的爆发期，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1 日，两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分别达到 8897 例和 1766 例。在防控措施上，韩国部分企业停工，日本学校停课但工厂不停工。后续两国是否会采取类似中国的全国性隔离停产措施尚不明确，但如果其效仿中国，必然会对其物流交通、企业生产以及对外贸易造成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东亚的产业链。

对中国市场的出口比重最高，达到 30.69%；日本对韩国出口份额较高的产品为初级产品和半制成品。在东盟十国中，泰国与越南所占日本的出口份额较大，其中出口到泰国的半制成品和零部件比重较高，出口到越南的初级产品比重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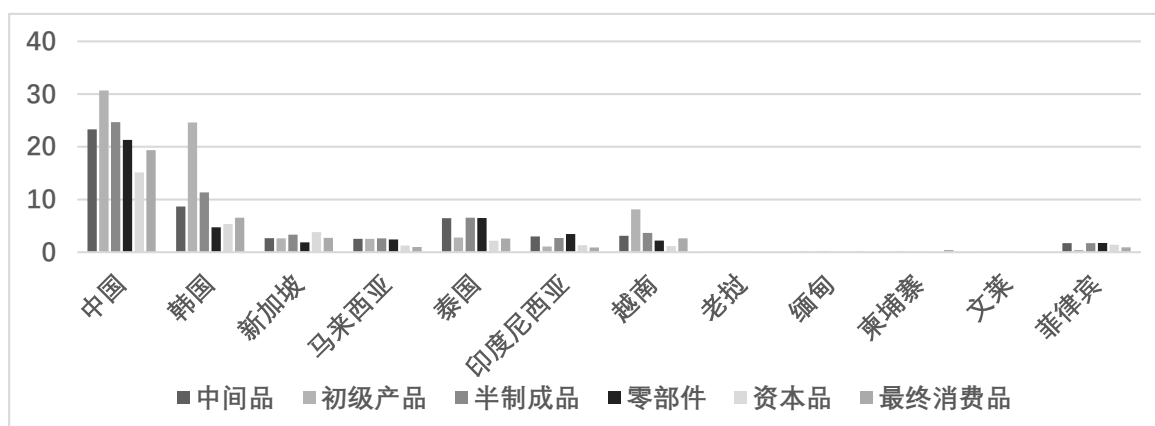


图 6 2018 年日本细分产品出口中各东亚经济体所占比重 (%)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从日本三类产品出口中各东亚经济体所占的份额来看（见图 6），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是中国与韩国，而东盟十国所占的比重都比较低。具体到细分产品上，日本的中间产品、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均有超过 15% 的份额出口到中国，其中中间产品中的初级产品

从韩国三类产品出口中各东亚经济体所占的份额来看（见图 7），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十国中的越南是韩国各类产品的主要消费地。韩国的中间产品有将近三分之一出口到中国，在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上，中国所占份额也比较高，并且远超于日本。韩国对日本出口的中间产品占韩国中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在初级产品上份额较大，达到 22.45%，此外韩国也是日本最终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在东盟十国中，仅越南在韩国的中间产品特别是零部件的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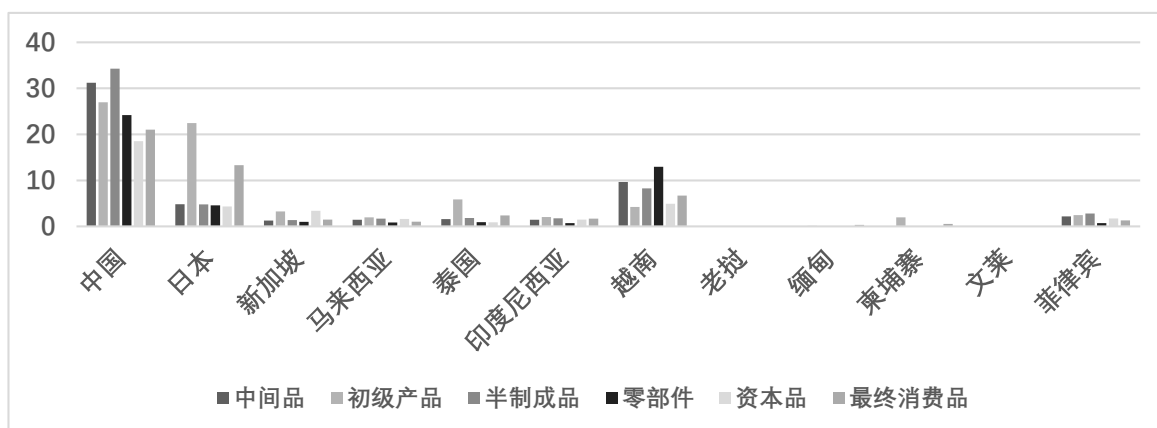


图 7 2018 年韩国细分产品出口中各东亚经济体所占比重 (%)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若日本和韩国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导致其国内的生产、物流和贸易中断，其作为东亚产业链中上游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供给方主要会对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泰国以及越南的厂商造成较大影响。当前中国国内的疫情虽已经得到基本控制，复工复产开始有序进行，但是东亚产业链在中国中断的部分却可能会因为日本和韩国的生产活动停摆而无法及时恢复。

（三）疫情全球蔓延对东亚产业链的影响

由于早期人们对新冠肺炎传染性的严重低估，各国政府疏于防范，新冠疫情随着人口的流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截止到 3 月 21 日，共有 182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其中与东亚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美国与欧盟的防疫形势都不容乐观。

中国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多日维持在五十以内的较低水平，而 3 月 21 日，国外新增确诊病例 19386 例，并且仍处于上升趋势中，考虑到英国和瑞士等部分国家为缓解医疗机构的压力不再对轻症患者进行检测，其公布的统计数字无法反应真实的疫情状况，国外疫情何时达到高峰期仍为一个未知数。中国现阶段在推动复工复产和严防境外输入型病例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对中国和中国所处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

疫情的全球蔓延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外加石油价格战的推波助澜，全球资本市场信心严重受挫，3 月中上旬美国股市三次触发熔断机制，超过 11 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因受到美股暴跌的交叉传染也触发了熔断。为应对疫情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月 13 日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同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也都纷纷升级防疫措施。截至 3 月 21 日，已有超过 40 个国家为应对新冠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至少 18 个国家宣布关闭国境，意大利等 6 个国家进行全国“封城”。

一方面，因控制疫情蔓延的需要，各国实行更严厉的封堵停措施，使得境内正常的生产、消费活动大幅度下降或者中断，这将直接减少对全球货物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为人传人的特点以及当前特效药和疫苗的缺乏使得全球恐慌不断加剧，各国政府因此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比如禁航禁运、提高进口检疫标准、限制与疫情严重国家的贸易往来等，这将放大已经有所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对本已虚弱的全球货物贸易造成进一步破坏，并且还将制约全球人员的流动，不利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从全球分工的角度来看，东亚大部分国家主要从中间产品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到国际生产网络中。欧美发达国家是东亚产业链中最主要的终端市场，来自欧美的市场需求是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贸易数据上看（见表 1），2018 年美国 and 欧盟的总进口中分别有超过 30% 和 25% 金额的产品来自中日韩三国，其中中国所占的比重都最大，超过日本和韩国总和的两倍。而从三国各自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来看，中国和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相近且都较高，韩国略低。

表 1 2018 年中国、日本与韩国对欧盟和美国市场的依赖度

	美国对其进口/美国总进口	对美国的出口/其总出口	欧盟对其进口/欧盟总进口
中国	21.57	19.23	19.91

日本	5.59	19.05	3.55
韩国	2.92	12.08	2.57
加总	30.07	-	26.03

数据来源：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导致的欧美发达国家进口下降将从需求端对东亚产业链造成负面影响，并且由于中国处于将东亚生产网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最终加工装配环节，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

此外，为控制新冠疫情，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较为严格的隔离加封锁的“休克疗法”导致了大量位于中国产业链下游的国外厂商由于中间投入品的缺货而无法继续正常的生产，一些厂商甚至还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和破产情况。这可能会使本来就受中美贸易战关税上升影响而考虑将原先布局在中国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分散和降低风险的需求，加快研究在东南亚建立替代工厂的可行性。

鉴于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特定行业具备东南亚低工资国家所不具备的高技术劳动力，以及具有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的产业和供应链短期内无法被完全取代，但是一些对劳动力和产业间合作要求较低的低端产业有较高的被转移出去的风险。

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会对中国在东亚以及全球产业链中的中枢地位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虽然考虑到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决策是长期的、综合性的和战略性的，短期的新冠疫情对其影响有限，但仍需重视这个问题。

三、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未来展望

新冠疫情对全球三大生产网络都造成了重创，且其影响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扩散并在回荡反射中不断加深。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股市暴跌、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新冠疫情增加了国际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倒退可能会改变东亚产业链未来的发展走向。

由于东亚大部分国家主要从中间产品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到国际生产网络中，欧美国家的市场需求是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基于这样的发展模式，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当前为防止新冠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欧美许多国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物流人流进行限制，导致本已有所

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贸易受阻，从需求端对东亚产业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伴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和区域内中产阶级数量的快速增加，东亚区域自身有潜力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市场。因此为了保障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摆脱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依赖从而减缓外部冲击，东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培育区域内市场，改变以往“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模式，从生产基地向生产和消费基地转型，形成内生性增长动力。

在东亚区域向更加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区域内产业链的长度可能会有所收缩。

虽然通过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将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进行有助于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极大的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分工过于分散化会加剧供应链的风险，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比如疫情、贸易战或者战争，就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进而导致产业链断裂。因此未来东亚地区的发展趋势是减少产业链中分散到不同国家的生产环节，弱化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而各国家或地区将产业链中主要的生产环节本国化，将导致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联系紧密度下降。

（二）政策建议

（1）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培育东亚内生性增长动力

中日韩三国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初级产品、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且都已深度融合到东亚产业链中。在国际经贸格局重构与逆全球化思潮重新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与日韩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变得日益紧迫与重要。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一方面能通过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强三国抵御类似于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的能力，降低外部冲击对东亚产业链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中日韩三国全方位提升贸易与投资合作水平，深化东亚区域产业链和培育区域内市场，减少东亚区域对欧美国家市场的依赖，促进东亚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改善营商环境，确保国内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

在因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贸易壁垒增加以及新冠疫情造成部分东亚生产链断裂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可能会重新审视其在中国的生产布局规划，将关注重点从成本和收益转移到分散风险上来，考虑将布置在中国的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或者将产业迁回母国，通过本国化降低风险。对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确保国内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提升全球下游生产商对中国的信心，维护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3) 稳步推进复工复产，积极扩大内需

为防控新冠疫情，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较为严格的隔离加封锁的“休克疗法”导致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正常生产和销售活动中断，使得原本处于增速换挡期的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而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故而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需要尽快恢复国内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出台稳定就业、稳定外资外贸的政策，在国外新冠疫情高峰尚未到来之时，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以此对冲国外需求可能的下滑，降低复工复产企业可能遭受的二次冲击，实现中国经济快速恢复。

(责任编辑：龙颖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

叶初升

一、新型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依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从“六稳”视角出发，（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分析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第一，对就业的冲击。

仅从经济的角度看，限制人员流动和大面积隔离的管控措施可能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本次疫情对就业的冲击，第一波发生在服务行业，第二波将发生在出口产业链上。服务业已是我国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至 2018 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为 46.3%），如果服务业因为疫情而大幅滑坡，那么上半年就会陡增失业压力。预计 2020 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可能会超过 6%。更重要的是，从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看，以中低端劳动力居多，因此，疫情可能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

第二，对金融的冲击。

疫情变化会改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新型肺炎疫情蔓延以来，汇率贬值、股市下跌的幅度都比较大。离岸人民币汇率从 1 月 21 日的 6.86 贬至 1 月 30 日的 7.0027；上证综指则从一月份的最高点下跌了 4.5%。

第三，对外贸的冲击。

一方面，隔离管控措施可能使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出口企业停产；另一方面，如果疫情在 2 月中旬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有部分国家和地区会减少或暂停从中国进口与疫情相关度较大的商品，或者提高对于中国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的卫生检疫标准，从而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负面影响。此外，由于工厂停工、国际交流相对隔离等原因，一些外商可能会改选其他供货商。不排除一些国际竞争者借机渲染、夸大中国疫情的消极影响，抢夺中国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对外资的冲击。

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和供货的及时性有很高的要求，如果生产和运输的任一环节因为新型肺炎疫情而停工，都可能造成链条的断裂。因此，有些跨国公司可能重新安排供应链，为分散风险而转向其他市场购买或投资。当然，一些医药、医疗器械行业的国际企业则会抓

住机会迅速扩产，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做好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准备。

第五，对投资的冲击。

由于人员、资本、重要设备及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流动受阻，一些项目暂停投资或施工建设放慢；许多商务会议、商务旅行、各种投资和项目考察等正常的商贸活动被人为推迟或取消；项目审批、招标等有关工作会暂停或延期。在长期，疫情会通过投资变化影响经济结构调整。

第六，对预期的冲击。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相对脆弱。大众高估眼前风险，疫情导致市场预期从高处跌落。如果任由这种预期发酵，可能会引起金融市场恐慌，增大流动性风险。一旦传到实体经济，会阻滞信贷、投资和生产，打断中国经济的小周期回暖。

二、疫情对武汉产业的影响及其联系效应

疫情对餐饮、旅游等第三产业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并且随着未来疫情逐渐趋缓，服务业会逐渐修复。但是，疫情对武汉制造业的冲击不仅会造成武汉停产，还会通过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企业。

1. 在半导体领域，武汉产品的市场份额较小，如果疫情造成武汉停产，对下游影响不大。

武汉的“长江存储”代表了国内存储芯片的最高水平，下游多以移动设备、计算机、数据中心和消费电子产品为主。不过，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生产国是韩国、日本和美国，“长江存储”的市场占比非常小，如果因疫情停产，对下游的影响应该不大。

2. 在显示面板领域，如果疫情造成武汉停产，影响范围有限。

“天马微电子”在武汉生产柔性屏和刚性屏，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和医疗提供中小尺寸面板，下游客户较多，但也有较多替代厂商；“京东方”在武汉主要生产 65 和 75 寸高分辨率液晶显示面板，下游主要是电视厂商，目前还没有规模生产，即便因疫情停产，对下游应该没有影响；康宁玻璃基板项目于 2019 年投产量产，但它在国内已有北京、重庆、合肥三个工厂，对下游影响可能仅限于湖北省内面板厂。

3. 在光通信领域，如果疫情造成武汉停产，负向影响较大。

“长飞光纤”在光纤、光缆及光纤预制棒三大领域的主营业务世界第一，因为市场份额较大，如果持续停产可能对下游产生影响；“烽火科技”主要生产传输设备和光通信设备领域，处于 5G 产业链中上游，相关领域有华为和中兴作为替代；“光迅科技”主要生产光模块，处

于 5G 产业链中上游，相关领域有替代厂商，对下游的影响应该比较有限。

4. 在激光领域，如果疫情造成武汉停产，不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的断供。

“锐科激光”是光纤激光器的研发和生产企业，主要应用于激光制造如打标、切割、焊接、增材制造等领域，相关领域有其他厂商替代；“华工科技”是以激光设备、传感器、通信设备为主业的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工业、钢铁冶金、船舶工业、通信网络等领域，相关领域也有替代。

5. 在消费电子终端生产领域，如果疫情造成武汉停产，只存在产能转移的时间问题。

武汉有富士康园区，华为武汉研究所，小米武汉总部，联想、大疆等终端企业的生产线。如果疫情造成武汉停产，终端生产可转移部分产能至其他地区。

6. 在汽车领域，如果停产时间较长，则对下游整车生产有一定影响。

世界 500 强“东风汽车”是武汉汽车装备制造业的龙头，围绕着它聚集了东风乘用车、东风本田、神龙汽车、东风雷诺、上汽通用五大整车企业。整车厂吸引了大量零部件企业的集聚。武汉有 380 家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企业，涵盖底盘、变速箱、车身、电子、内饰、玻璃等主要零部件。因此，如果持续停产可能对下游整车生产有一定影响。

长期来看，一旦疫情消失、生产恢复，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最终也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疫情导致一段时间持续的停产停工，处于各类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破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就业问题和民生问题。

三、新型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疫情并不是经济危机，只是对经济运行的一种外生冲击。换句话说，对于经济有机体而言，疫情不是“病”，而是一种“伤”。从目前的疫情发展态势以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看，本次新型肺炎疫情还只是一种“轻伤”，疫情不会改变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地位。

粗略估算，疫情对 2020 年 GDP 增速负向影响可能在 0.6 至 1.2 个百分点之间。最终呈现的结果，还取决于经济政策产生正向效应的强度。

乐观地估计，本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半年左右。影响较大的时间是在第一季度。以 2019 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 6.4% 为参照，2020 年第一季度 GDP 增速可能会在 5.0% 左右，甚至可能会低于 5.0%。

疫情通过影响居民心理、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以及对外贸出口等诸多方面，改变社会

总需求结构，从而对国民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疫情是“厚此薄彼”的：对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商贸餐饮业、娱乐业和会展业施以较大的负向冲击，对医疗器械产品、医疗卫生防疫为主的医药产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并刺激健康产业、保险业，以及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产业的发展。这种差异性将在长期影响投资的方向。

四、应对疫情冲击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相信政府会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抗御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冲击，2020 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划目标。

第一，通过各种媒体，以各种方式（特别是实质性的经济政策），在全社会树立经济发展的信心，这是抗御疫情冲击的第一道防线。

疫情对经济产生不利冲击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影响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却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主体的信心密切相关。如果企业的投资意愿、居民的消费意愿随信心的下降而走弱，悲观预期就容易“自我实现”，从而使疫情的负面影响长期化。

第二，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建议财政赤字率上调至 3%（2019 年为 2.8%），即增加约 2000 亿人民币的财政支出，结构性发力。考虑到疫情对 CPI 的影响，可先行启动财政政策，下半年在启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三，对特定的行业、部门、地区、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于受冲击深重的行业和地区，可以考虑一段时期内的税收减免；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缓和去杠杆政策力度，为困难企业的贷款提供临时性的贴息；救助和帮扶那些受疫情冲击而失去工作的劳动者，特别是缺乏良好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第四，加大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展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培训。

（责任编辑：龙颖楨）

中国经济多管齐下保增长的对策举措*

简新华

2020 年中国要打赢两大战：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二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脱贫攻坚战，任务十分艰巨严峻。这两大战斗都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前者已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造成长达数月的大范围的停工停产、极不利于经济增长，后者要求国民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不能下降太多，否则不仅今年需要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不能最终脱贫，甚至已经脱贫的农村贫困人口可能还会返贫。中共中央 3 月 18 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因此，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主要有两件事，除了继续坚持进行疫情防控之外，还必须千方百计保障经济增长。

要想合理有效保增长，首先需要弄清现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归纳起来说，近年来，引起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下行的基本因素，主要是包括企业制度不健全、所有制结构不完善、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不足、市场体系和监管有缺陷、政府调控不完善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完善，还不能适应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的要求，导致以投资和出口为主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转变成为以创新为主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还不优、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从而造成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短缺、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再加上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影响、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结果引起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下行。这些基本因素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还会继续发生影响，特别是 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得“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使得中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长达数月的大范围的停工停产，而且目前在世界上也扩散蔓延开来，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不少国家将可能遭受类似于中国这样的严重损失，将可能阻碍全球的人物流资资金流，破坏世界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股价、油价的剧烈波动、大幅下跌，将使得已经不景气的世

* 本文原载《经济要参》2020 年第 20 期。

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雪上加霜，面临普遍的下行压力，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 响。

笔者认为，针对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抗疫情保增长必须对症下药、多管齐下、有差别地施策。总体而言，针对导致经济下行的上述基本因素，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针对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应该注意采取以下重要措施。

一是尽快尽早消除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国外疫情呈现爆发式扩大的情况下，更要特别注意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输入”，消除疫情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为更早更快更好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复工复产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首先尽快恢复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逐步尽可能恢复人流。国民经济活动也就是人、物资、资金、信息的流动，要保持经济增长，就要恢复经济活动，要恢复经济活动，就要使得人、物资、资金、信息正常甚至加快流动。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人流要受到限制，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所以首先应该采取措施、创造条件，畅通各种流通渠道特别是电子信息网络、物资、商业、交通运输渠道，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更快发展，尽快复商复市，恢复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复工复产创造必要的更好的条件。

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城乡居民的就业、收入、消费、民生受到重大冲击的情况下，需要实事求是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在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求与供给两侧发力、结构调整与“三驾马车”双管齐下，甚至在必要时合理补贴和促进城乡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以更有效地保增长，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战疫情稳增长的实际需要，适当合理增加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特别要注意积极有序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复工，发挥好有效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导致的比较普遍的停工停产，虽然有利于“去产能、去库存”，但是复工复产也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有差别的复工复产政策，重

点恢复和发展农业、供不应求的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趁机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不能让已经淘汰的落后过剩产能又死灰复燃。

五是尽可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国有企业的排头兵引领作用。国有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大中型国有企业实力雄厚、总体技术比较先进，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国有经济和国家力量、公立医院和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军队医院和医疗卫生机构）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就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这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原因，现在复工复产、保增长同样也要尽可能首先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让国有企业带头复工复产，能够更容易更快更好更有效地保增长。

六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造成许多产业停产、经济活动停工，虽然疫情防控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主要是国家的投入，但是在就业和收入上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农民工、城市贫困家庭、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的劳动力、个体工商户和相当部分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所以在复工复产、保障经济增长中实行必要的投资和救济，重点帮助和扶持这些个人、家庭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和开工、度过难关，保护妇女儿童，保护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七是做好复工复产的服务工作，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用工、资金、运输、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补上“断点”；做好法律、咨询、调解服务等工作，及时有效化解合同履行、企业债务、劳资关系等纠纷。

八是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联系，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坚持合理有效改进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引资、展会服务模式，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努力促进国际贸易，加大力度向国际市场供应原料药、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等产品，为世界疫情防控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积极促进各国协调应对措施，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确保重要医疗用品、关键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正常跨境流动，在落实防疫措施前提下为商务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保障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责任编辑：龙颖楨）

化“危”为“机”，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成德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将是人类的一场持久战。我国要未雨绸缪，准确评估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以便我国采取有效应对策略，化“危”为“机”，这是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

进入 21 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以及冷战结束，阻碍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然壁垒和制度壁垒大幅度减少，经济全球化取得巨大的进展，全球产业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演进。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布局产业链，在一些国家开展研发和产品设计，然后利用一个国家提供的原料，到另一个国家组织生产和制造，把产品销售到其他国家，从而构建出一个高度分工、相互依存的全球产业体系。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在短期内直接造成全球部分产业链的断裂，影响全球经济的恢复，在中长期则会带来全球产业链转型和重组，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

1. 疫情在短期内造成全球范围内部分产业链的暂时性断裂，很可能导致全球进入衰退。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活动相继停止，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各国也采取关闭边境的临时性措施，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大幅度减少，对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造成巨大的冲击，成为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于全球产业链是高度依存的，在制造供应商、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无数相互交织、覆盖全球的网络，产业链条上的一个供应链的中断，就可能波及整个产业链陷入瘫痪，带来系统性风险。就如同一组串联的电路，只要一个开关跳闸断开，整个电路都会断电。目前，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中国已经成功阻断了国内新冠肺炎的传播，复工复产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但作为许多产业链上游的欧美国家，还陷在疫情爆发的高峰时期，企业停工停产，一时难以恢复生产，全球供应链中断。一些国家大量人员失业，商品和人员流动受到限制，居民收入下降，不得不削减消费，全球需求也在萎缩。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引发各国竞相关闭边境、保护本国产

* 本文原载 2020 年 5 月 6 日人民论坛网。

业的临时性措施,在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怂恿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惯性维持下去,全球经济很可能进入严重的衰退时期,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2. 疫情导致各国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布局将出现重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基于追求利润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将生产链环节布局到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以便利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扩大跨国公司利润。效率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决定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要因素。但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兴起一股反思全球化的倾向,认为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平衡,不平等程度扩大。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兴起,许多国家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倾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会进一步助长这种情绪,造成全球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欧美一些国家将新冠肺炎防疫政治化,极力掩盖政府防疫不当的错误,给全球合作防疫带来障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这种国际政治现实,使各国不得不更加重视经济主权、供应链稳定和产业安全。种种迹象表明,欧美发达国家将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供应链的稳定性,通过制造业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和民生相关的产业召回国内,或者布局到与自己国家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和地区。这将导致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布局将出现重大变化。

3. 疫情将导致全球产业链进一步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推动全球信息经济的发展。这次疫情导致许多国际之间的线下交流和交易中断,但也为线上交流和交易创造了机遇,催化了一批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首先,疫情防控推动了智慧城市、智慧社会建设步伐,各国纷纷用新的技术来提高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治理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带动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服务在全社会的应用。其次,疫情防控要求员工不能聚集,企业为了复工,会加快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从而激发了企业实现自动化、智能化转型的内在动力。再次,疫情导致人员不能面对面频繁接触,从而也促进了远程教育、远程诊断、在线办公等新型终端应用的发展。总之,疫情导致商品的运输和人员的接触困难重重,但信息的交流却几乎不受影响。一些基于信息生产、传递和使用的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推动着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发展。

二、我国的应对之策

在当前全球疫情仍在继续扩散蔓延、疫情传播尚未彻底阻断情况下，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是我国打好这场疫情防控战下半场的关键。我国要利用好疫情防控战率先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条件，精准施策，化“危”为“机”，克服疫情对产业链带来的短期冲击，抓住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长期机遇，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 积极倡导和加强防控疫情的全球团结合作，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的做法。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程度的大小，首先取决于疫情蔓延的范围和存续时间的长短。全球要摆脱经济衰退，必须在疫情防控上取得胜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防控病毒蔓延，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要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能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其他国家都无法放松对疫情的防控，国家交往就难以正常开展。因此，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现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为了逃避其政府防控疫情不利的责任，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恶化了国际社会的互信，给全球合作防疫造成了很多障碍。还有一些国家，放弃积极主动防控疫情，寄希望于被动的群体免疫，对这种不负责的行为，我国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因此，我国要积极倡导全球在防疫方面的团结合作，继续主动与世界各国加强疫情信息共享、防控经验交流，在诊疗方案制定、药物疫苗研发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倡导世界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帮助脆弱国家完善卫生体系，增强防控疫情的能力，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2. 各级政府要主动作为，充分发挥我国已经控制住国内疫情的有利局面，分类施策，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对产业供应链中断和需求萎缩带来的短期冲击。疫情对我国产业链的冲击，不同的行业影响各不相同。一些行业供应链并没有中断，但是由于顾客短时期内大量减少，需求急剧萎缩，产品和服务找不到销路。这类行业主要包括国内的酒店、航空、餐饮、实体零售店等和面向海外出口的光伏、消费电子、家电以及纺织制造等。另一类行业则是由于供应链中断，中间产品无法供应，生产被迫中断。这类行业主要是需要从欧美进口关键零部件的汽车、机械设备、航空航天等产业。还有一类行业则是受供给中断和需求萎缩的双重

影响，企业一时难以复工复产。许多外贸企业除了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物资出口有所增长之外，大量出口订单被取消。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 6.4%，其中出口下降 11.4%。

为应对疫情的这种短期冲击，目前国家税务、财政、金融、社保等部门都已经出台了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税费优惠和贷款优惠政策，各地政府也纷纷实施了扩大消费的措施。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主动作为，深入企业，真正弄清楚企业复工复产中的“堵点”和难点，分类施策，落实国家的帮扶政策，让企业真正享受政策红利。应该看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消费潜力大。在控制住疫情后，受疫情影响而萎缩的消费预期可以恢复，一时受需求萎缩影响的行业也将恢复正常经营。针对进出口下降的情况，我国要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前提下，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千方百计保障国际物流畅通，让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帮助企业稳定供应链和恢复出口。当然也可以积极引导企业根据国外疫情的新发展，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实现出口转内销，帮助出口企业摆脱经营困境。

3. 我国要抓住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机遇，加快推进产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我国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各国不断封城、封国，导致球跨境投资、货物贸易和人员往来大幅减少。过去高度分工、相互依存、高效运转的全球产业链暴露出极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全球生产协作面临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许多发达国家也基于产业链完备性、稳定性的考虑，开始要求制造业回归本土，全球产业链将进入重大调整和重组的阶段，全球产业链也出现加快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变的趋势。我国也要瞄准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跳出线性思维模式，发挥后发优势，绕过发达国家的一些弯路，在产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实现“蛙跳式发展”。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打造“买全球、卖全球”线上合作平台，抢占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的新高地，掌握更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实现从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转变，推动我国整个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

4. 充分利用我国工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构建起“自主可控、灵活稳定”的产业链网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过短短 40 多年，迅速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制造业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 30% 的份额。但是，我国过去主要是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不仅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更重要的这种“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使我国对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性和可控性弱,全球产业链条与国内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发生“断点”和“裂缝”,对国内发展的延伸性和拉动性也不强。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和重组过程中,我国要发挥优势和有利条件,构建起“自主可控、灵活稳定”的产业链网络。

首先,要发挥好我国率先取得疫情防控战胜利的有利条件,继续引进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环节。我国是全球最早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之一,完全有条件成为全球资本和产业的避风港。现在一些国家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要求制造业回归本土,但跨国公司对利润的追逐不会改变,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模大的优势也不会变。只要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我国对全球产业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仍将是全球跨国公司主要的投资的目的地。

其次,要发挥好我国市场规模庞大、需求增长迅速的优势,增强我国企业对全球产业链的整合能力和控制能力。技术和市场是决定产业链整合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一直是全球产业链的整合者和治理者,我国也可以借助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构建出由我国企业主导和支配的全球产业链网络。我国要充分发挥好市场规模大、增长快的优势,培育和发展一批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掌握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这些领导型企业可以基于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通过逆向外包,向全球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使自身成为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链主”和治理者。这种基于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打造的产业链网络,我国企业自然就具有控制力和主导权。

再次,要发挥好我国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链的完备性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强大和完备的产业体系,成为后疫情时代我国构建稳定产业链的独特优势。我国在后疫情时代,要充分利用好地区之间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等的差异性,发挥好产业链在国内转移空间大的有利条件,鼓励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大企业把加工生产和零部件制造等辅助性的生产链环节分包给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间的生产网络,把更多东部地区迁移出来的产业链留在中西部地区,增强我国产业链的完备性和稳定性。

(责任编辑:龙颖楨)

新冠肺炎疫情对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影响与对策

叶初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效。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6%[†]。脱贫攻坚期间，通过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实现贫困人口的增收、就业，是各地脱贫的最重要措施，也是 2020 年以后缓解相对贫困、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进而影响贫困人口的增收和就业，并对 2020 年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影响

1. 疫情冲击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导致贫困人口农业生产性收入下降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30 个省区先后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为防止疫情扩散，除防疫以外的一般性交通物流基本停滞。与此同时，各地层层设立劝返点，不得外来人员和物资进入。各地市场交易活动基本被叫停，除保障生活必需品以外，其他商业活动不得开展。这对于农户的生产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一是，农产品需求的下降。各地休市导致农产品销售受到很大影响，如蔬菜、水果、肉类等。据估计，疫情期间带来的春节期间消费下降达 50% 以上。二是，农业生产相关资料的供给中断导致正常的生产活动受到冲击。主要的表现是，饲料、肥料、种苗的供给不足，养殖业影响首当其冲，种植业也受到一定影响。

2. 疫情冲击非农业生产发展导致贫困人口外出就业机会下降和工资性收入减少

受疫情影响最直接的是餐饮、交通运输、旅游娱乐业等服务业。同时，受负向冲击的还有制造业、建筑业、物流仓储业等，这些影响既包括延迟复工导致的生产中断和销售下滑，同时还有社会总体需求下降导致的行业性收缩。根据抗风险能力的差异，中小型企业、自我雇佣的个体经营户将首先受到冲击。由于这些行业都是农村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就业最为集中的行业，疫情将对贫困人口导致一定程度的就业冲击，从而降低了一部分贫困人口

外出务工的机会。即便2月中下旬部分省市已陆续复工，受生产订单的影响，大量依靠计件绩效的务工人员不得不接受减薪甚至下岗。这些因素都将导致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下降。处于疫情核心区域的湖北省，包括了武陵山区、大别山区等连片贫困地区，2019年底有贫困人口约5.8万，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551万人的十分之一。考虑湖北地区解除疫情至少要比其他省区晚1-2个月，人员外出务工时间也将进一步延迟，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将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

3. 疫情不利于产业扶贫项目和就业扶贫项目的正常实施导致贫困人口的收入减少和就近就业机会下降

我国在脱贫攻坚期间实施了各类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项目，从多种渠道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其中，包括当地龙头企业在内的新兴经营主体带动贫困人口增加的生产经营性收入、贫困人口在当地新型经营主体内实现就业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贫困人口通过扶贫产业项目入股带来的资产收益。贫困地区当地的新型经营主体涉及的产业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初加工、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为主，疫情期间，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间物流、交通受限制，新型经营主体销售的农产品及其初级加工产品出现“滞销”的现象；另一方面，乡村旅游观光业整体处于停摆状态，部分依赖乡村旅游观光项目脱贫的农户将受到直接影响；再者，新型经营主体因复工受疫情影响，部分依赖扶贫项目实现长期就业和短期就业的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和就业机会均会下降。

4. 疫情加大了部分地区贫困人口的返贫风险

脱贫攻坚期间以来，快速减少的贫困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刚刚脱贫状态的脆弱性贫困人口，他们整体收入水平还不高，且收入来源较为单一、生产规模较小、自身积累较少，从而表现出较低的抗风险能力。此次疫情对这些脆弱性贫困人口冲击较大。对于贫困人口而言，更为重要的可能来自于供给端的冲击，如生产资料供给不足、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流动性资金紧张等，受市场的影响一部分农户需要贱卖种养殖产品，甚至于生产资料，以满足生计。供给端的冲击会导致资产缩减，可能使得部分已经脱贫的农户再次陷于贫困状态，在部分地区贫困发生率可能出现小幅反弹。

二、相关对策

1. 提高贫困人口的农业生产性收入

短期而言，尽快恢复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通畅运行。在保证抗疫工作的同时，尽可能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不中断，按国务院2月18日会议精神，使得农民能够不误农时。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的省区，应尽快保证饲料、化肥、种子、种苗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正常供给，同时加强市场监管，确保生产资料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对于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应对各贫困县进行定向补贴，包括生产资料购买、市场收购补贴、生活补贴等，以帮助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渡过难关，防止更大规模贫困的发生。

长期而言，推进“保险+期货”金融扶贫模式，提高农业生产发展的抗风险能力。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明确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开展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然而，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不同于传统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市场风险，而保险公司又缺乏较为有效的风险分散手段，致使国内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整体规模不大。在本轮的脱贫攻坚中，一些地方将这种保险产品进行创新，扩展为“保险+期货”扶贫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分散农业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同时还有助于保险公司将价格风险转移到风险管理能力更强的期货市场。因此，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保险+期货”扶贫新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保障其农业生产收入，也有助于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

2. 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

短期而言，一是要对务工人员做好健康检测工作，并建立健康检测互认机制，保障健康务工人员返岗就业。二是要组织开展对用工集中地区和集中企业“点对点送人到岗”专车（专列）运输服务，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安全有序返岗复工。三是建立网络招聘信息平台，提升线上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为暂时失业的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对于就近就业的务工人员，相关部门应通过政策倾斜和支持，鼓励本地企业积极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长期而言，建立和完善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机制，提高劳务输出脱贫成效，助力贫困人口就业脱贫。疫情期间，劳务输出地相关部门可借助“数字化”的方式，一方面做好建档立卡务工人员摸底排查、信息识别、组织动员等基础工作，另一方面，应针对输入地的用工需求，开展相关的线上技能培训工作，做好对接。另外，各地要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对接收建档立卡务工人员较多的用工企业，可以适当方式给予支持。

3. 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产业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关键。产业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迫切解决产业扶贫项目因疫情影响带来的产品滞销问题，相关部门要推动产区和销区构建“点对点”的对接关系，把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项目农产品作为疫情防控期间“菜篮子”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来源。其次，要多途径协调解产业扶贫项目经营主体的生产资料供给问题、“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以及用工难问题，支持帮扶企业复工复产，稳妥有序推进贫困人口返岗就业。再者，通过产权激励政策，鼓励贫困人口以资金、资产或劳动技能入股，激发产业扶贫项目的内生动力，帮助当地贫困人口长期脱贫。

4. 适当调整部分地区的脱贫时间表

疫情严重程度呈现高度分化，总体是以湖北为核心，并向中西部的河南、湖南、江西、安徽、重庆等省市拓展，因而对市场的冲击程度也将是分化的。鉴于此，建议这些省市在 2020 年全面脱贫的目标适当展期。特别是这些省市贫困县、贫困村的摘帽考核工作暂缓实施，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扶贫干部更大的空间。相应地，各类扶贫政策在这些地区因适当延期。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除，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通过电话、视频等线上方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时效难免受到影响。实际上，调整这些地区的脱贫目标，既不影响我国在 2020 年整体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也有助于实质性提高脱贫质量。

（责任编辑：龙颖桢）